

流動人口與城市融入

——九位“澳門—珠海”跨境勞工的生命史研究

皇甫錚

[摘要] 跨境勞工作為特殊的勞工群體，每日往返於澳門—珠海兩座城市，他們對於城市的印象與城市居民、遊客等其他群體截然不同。通過對9位跨境勞工的生命史訪談的經驗資料，本研究發現，跨境勞工群體對於城市的印象伴隨着居住空間的分隔而產生分異，“語言”是城市融入的重要門檻，“婚姻移民”則是勞工“進入”城市的重要途徑。伴隨跨境生活，勞工在與他人的人際交往中，積極尋求縮小“空間隔離”帶來的“社會融入”差距，從而不斷改變對於“身份”的認知，“身份”的界限伴隨勞工的生活而越發模糊。在此基礎上，跨境勞工對於城市的印象，隨着空間、社會融入的改變，而產生了不同於其他群體的全新固化印象。

[關鍵詞] 澳門 珠海 城市融入 跨境勞工

人是構成城市發展的主體。城市作為關係性空間，連結着“人”與“社會”的進程。以傳播為媒介，架起了城市與人之間的關係。伴隨着城市的發展，現今的城市空間將其中的地理區隔越發縮小，城市作為開放性系統，為人、物、資訊等要素的自由流通提供空間。澳門—珠海即是如此，從地理位置上來說，澳門—珠海僅有一關之隔，從珠海過關前往澳門只需十分鐘左右，這為人口的密集、快速流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，外地勞工成為澳門特殊的勞工群體。根據2017年2月澳門勞工事務局統計的外地僱員人數顯示，中國內地在澳門的勞工人數為113,828人次，在澳門的外地勞工，指不享有澳門居住身份、經澳門特區政府批准而獲得在澳門就業的非本地勞工。^①大量的外地勞工入境，不僅將澳門—珠海兩座城市之間的地理區隔縮小，同時也為這一全新的流動群體，賦予了更多的社會認知。澳門—珠海在地理空間上的緊密聯繫，使得內地勞工在澳門工作、珠海居住的“雙城生活”成為常態，跨境工作和生活成為勞工們的“活生生的日常”。這種城市之間的單日遷移，架起了跨境勞工群體與不同於本地人、遊客等其他人群間對城市印象的區隔。

城市作為人造的空間環境，不僅是傳統意義上人們居住的一種場所，更是“城市中各種力量的成長、組合和嬗變”的載體。^②城市空間不僅是現代化的象徵，亦是城市人口構成集體意識、

作者簡介：皇甫錚，浙江樹人大學人文與外國語學院講師、傳播學博士。郵編 310015

① 謝蓮秀：《澳門經濟發展與工會應對外勞問題的對策主張》，《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學報》（北京）2006年第5期，第25—30頁。

② 張京祥、吳縛龍、馬潤潮：《體制轉型與中國城市空間重構——建立一種空間演化的制度分析框架》，《城市規劃》（北京）2008年第6期，第55—60頁。

消費、生產的共通場域。空間、日常生活和生產關係的內在聯繫，使城市作為空間的一種形式而存在，資本利益而造成的人口分割和分散，使城市中心區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政治權利和商業功能，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空間被迫向周邊邊緣地區置換。^①這亦說明，為何數量龐大的勞工群體願意選擇在珠海生活——澳門高額的房租價格、生活成本等，使得他們不得不選擇居住在生活成本相對較低的珠海。以跨境的時間、距離、空間換取較低的生活成本，這種“缺席但也在場”的狀態，幾乎構成了跨境勞工的全部生活。圍繞着城市而產生的日常生活構成了空間、人口的轉向，這已不僅是地理空間的轉向，亦是生活空間與意識的流動。這種流動賦予了“跨境勞工”全新的身份感知，亦使該群體每日接觸的不僅是工作、生活，同時是在“跨境”的過程中不斷產生對城市的融入與體驗。以“跨境勞工”群體為代表的“雙城生活”特殊的社會群體，成為兩城社會、經濟、文化等要素的構成者。對於“城市”而言，他們不僅是城市的生產者，也是城市的消費者。本文將以“跨境勞工”這一特殊的群體為視角，通過對他們的訪談與觀察，深化這一群體對於“城市”的融入與感知。

一、相關概念界定

（一）流動人口與跨境勞工

從地域上來說，澳門—珠海的跨境勞工屬於“城城流動人口”的範疇。流動人口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已成為事實上的城市常住人口，成為不流動的“流動人口”，^②例如，有的勞工已在珠海置業落戶，未來依然會選擇在澳門工作珠海生活，他們的跨境生活已成為常態。

獲得俗稱“藍卡”（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）的內地勞工，有權在獲批的工作年限內在澳門工作和生活。出於研究的需要和採訪便利，本研究的跨境勞工的主體定為內地勞工，而不考慮如菲律賓、印尼等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勞工。由於目前暫無權威資料統計具體有多少內地勞工在珠海生活，本研究將以研究者所接觸的勞工為個案，展開分析。

（二）城市融入

勞工的大批量湧入，帶來的不僅是經濟、社會的發展問題，同時也是勞工的城市融入問題。“城市融入”包括空間的融入，亦有身份、地域、認同等問題的轉換。勞工進入澳門展開工作，不僅是地理空間的轉換，亦是生產和生活空間的轉換。生活空間的變化，意味着勞工必須要實現城市融入，適應城市的生活方式、交往規則與文化內涵。本研究的“城市融入”指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的社會融入或社會融合。^③參照Gordon對社會融合的七種方面：文化融入、結構融入、婚姻融入、態度融入、身份融入、行為融入和文明整合中的部分內容，^④同時結合珠海—澳門的實際情況，將身份融入、空間融入作為重點溝通內容，雖然在大部分研究中，空間融入很少作為城市融入的討論部分出現，但根據本研究對象的特點，空間融入將會作為重點的討論內容。對於勞工

① 吳寧：《列斐伏爾的城市空間社會學理論及其中國意義》，《社會》（北京）2008年第2期，第112—127頁。

② 殷京生：《城市、城市發展與城市流動人口》，《天府新論》（成都）2003年第1期，第76—79頁。

③ 朱宇、林李月：《流動人口的流遷模式與社會保護：從“城市融入”到“社會融入”》，《地理科學》（長春）2011年第3期，第264—271頁。

④ Milton M. Gordon, *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: The Role of Race, Religion, and National Origins*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64.

而言，進入澳門工作不僅意味着面對全新的工作環境，也是對城市的全新接觸與感知。同時，由於生命的進程是一個不斷推進的過程，因此個體對於城市的體驗是過去、現在和預期會發生的經驗的匯總。“城市感知”即是在城市中工作、生活以及其他經歷所形成的整體印象，這種整體印象和認知的形成包含着直觀感覺和理性理解的雙重作用。^①基於以上內容，本研究分為如下部分展開：

- (1) 跨境勞工在進入城市之前對城市的整體印象；
- (2) 進入城市後，工作生活的社會實踐對於個體經驗的重構；
- (3) 城市融入的渴望與路徑；
- (4) 個體身份的全新反思。

二、研究方法——生命史訪談

本研究希望通過生命史訪談，對被訪者的生命歷程進行梳理，繼而挖掘出他們的生活經歷、軌跡和對自身生活的解讀。通過他們對於“雙城生活”的記憶及故事，描述出個體對於“城市”的整體印象，以及他們是如何融入和改變城市印象的。這種半結構式的訪談，保留了每個個體的獨立的經驗性資料。同時，由於研究者作為學生時亦經歷過多年珠海—澳門的雙城生活，在進行訪談的過程中，以相同的生活經歷與被訪者進行溝通，共同挖掘出個體內心的真實感受。

三、資料收集、樣本描述與分析框架

(一) 資料收集

本研究採用滾雪球抽樣獲取被訪者。受到研究時長和其他外在因素的影響，本研究獲得9位被訪者資料並進行梳理。在訪談過程中，通過“生命史訪談”的方法請被訪者講述自己“跨境”生活的經歷、認知與感悟，並將被訪者描述的與研究主題相關的部分進行追問。

(二) 研究對象樣本界定與描述

根據本研究的研究需要，將被訪對象的個體特徵定義為：在珠海生活、澳門工作三年及以上者，符合澳門勞工事務局頒發的外地僱員中專業僱員條件、^②具有合法勞工簽證，且未來仍希望繼續以此方式生活的跨境勞工。研究者於2017年3月期間，共訪談9位跨境勞工。其中男性4人、女性5人。年齡分佈在27歲到38歲之間。從被訪者原籍分佈看，其中近半數來自廣東省，亦有山西、江蘇等其他省份。被訪者在澳的職業分佈為：媒體從業者、高校行政人員、公司文員等。近半數被訪者已在珠海置業。具體內容如下（表1）：

^① 秦潔：《都市感知：都市人類學研究的新視角》，《深圳大學學報（人文社會科學版）》（深圳）2011年第1期，第80—85頁。

^② 即受聘者具備高等教育學位，又或具備高度技能或專業工作經驗，且為履行具高度專業要求的工作。

表1 被訪者個人資料

序號	編碼	性別	年齡	在澳工作時長	婚姻狀況	現居住地	租房或置業	原籍	工作描述
1	YH	女	29	3	未婚	拱北口岸	租房	山西	電視台編導
2	YJH	女	27	3	未婚	石花東路	珠海置業	江蘇	財務
3	XX	女	28	4	未婚	拱北口岸	租房	蘭州	公司文員
4	TL	男	37	5	已婚	灣仔沙	珠海置業	廣東	電視台主持
5	GXW	男	32	4	未婚	夏灣	租房	廣東	醫院行政
6	YS	男	28	5	未婚	明珠站	珠海置業	河南	電視台行政
7	HF	女	27	3	未婚	樟溪	租房	廣東	大學行政
8	JHG	女	31	7	未婚	夏灣	租房	廣東	財務
9	RFM	男	38	9	已婚	拱北口岸	珠海置業	山東	老師

四、資料分析與發現

（一）城市疏離感與“婚姻”渴望

勞工在日常工作中需要與人大量溝通，但是這種接觸是表面性的、淺嘗輒止的。共同情感的匱乏、急劇的競爭、居無定所、階層和地位的差異、職業分工引起的個體的單一化等，使人和人之間的隔閡加深，個體倍感孤獨。^①同樣，這種孤獨感、壓抑感在跨境勞工身上最為明顯。如被訪者5：

澳門人大多是工作中認識，人都很好，他們從小沒甚麼競爭感，性格比較單純，原則性很強，但還是會覺得玩不到一起。現在一起玩的還是內地人，大家生活環境比較一樣，受的教育也相似，所以更能聊的來……我不住澳門，下班就要趕回珠海，很難會和他們一起party甚麼的，自然私下接觸也就少了……呆在這裏也有幾年了，但還是會覺得生活得有點壓抑。

顯然，對於被訪者5而言，人際往來和居住距離是城市疏遠感的最主要原因，但是當被訪者5主動提及自己現正交往了本地女生後，依然會流露出對於未來的新期待和想要繼續維持這種生活的規劃。

如果真的以後能結婚，當然還是希望留在澳門，福利這麼好，工資比內地高，但是未來的事誰也說不準……

訪問過程中發現，所有未婚人士無論男女，都希望通過找到本地伴侶，作為融入澳門城市的方式，這種對婚姻的渴望，遠超其他人群。“婚姻融入”成為跨境勞工認為的、能夠快速融入澳門社會的重要途徑與門檻。對於在異鄉工作打拼的人而言，以“婚姻移民”的方式獲得澳門的永久居留權，會比其他方式更為便捷，並且通過本地伴侶，能夠更快地適應、融入社會，從不穩定的異鄉人身份，變成穩定的“本地人”。

同時，對於被訪者而言，“語言”成為城市疏離感的重要問題。澳門屬於粵語語系，對於非廣東人而言，不會說粵語成為溝通的重要障礙。如被訪者1：

其實工作中他們會遷就我說國語，但有時候大家討論事情或者有分歧，還是會下意識的說廣東話，這個時候就會覺得吃力，雖然基本能聽懂，但我自己只會簡單的說幾

^① Louis Wirth, “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,” in J.K. *The Urban Sociology Reader*, New York: Routledge, 2005, pp. 32-42.

句，溝通是很大的問題……雖然在這挺久，但覺得廣東話比較難學，久而久之也就習慣現在這樣。

對於5位非廣東籍的被訪者而言，“語言”是融入城市的敲門磚。被訪者普遍會提及本地人會遷就他們說國語，但是自己不會粵語，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“短板”。由此，“文化同化”現象幾乎很難在非廣東籍被訪者身上看到。相反，對於本身是粵語使用者的廣東人而言，語言問題從未發生，他們更多的壓力來源於居住環境的“空間隔離”。“語言”、“婚姻”的融入，成為跨境勞工心中認為的“進入”城市後“身份融入”的重要象徵。從9位被訪者的訪談中均可發現，語言是影響人際溝通的重要因素，但是居住空間的隔離，是融入城市、維護人際交往的最大障礙，這也造成了個體始終覺得無法融入城市、對澳門具有疏離感的首要問題。

（二）從“空間隔離”到“社會融入”

居住空間對於個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而對於澳門—珠海兩地，雖然拱北關口實際過關距離不遠，但是並不意味着每日過關都很輕鬆。如被訪者1所言：

每天過關很累，即使我已經搬到距離關口最近的地方。如果碰上雨天，排隊很辛苦。每天往返上下班不堵車，也要三個小時的樣子，雨天或者碰上假期，還不一定知道甚麼時候才能回到珠海。

這種一關隔開兩座城市的生活，帶來的不僅是居住“空間隔離”的問題，亦是“空間分異”的問題。居住空間分異既包括居住隔離的結果，也包含社會中各群體空間社會距離變化的過程。^①然而如被訪者4、被訪者9等所述，他們的家庭環境決定了他們必須生活在珠海，如伴侶、孩子均在珠海工作、學習，這就意味着被訪者4、被訪者9等不得不必須承擔跨境勞工的生活。在日復一日的跨境生活中，居住環境決定了勞工無法真正融入社會，居住空間距離拉遠了同城市居民的交流，無形中拉開了社會距離。同時，如被訪者6所言：

是有提供宿舍，但是那是多人間，就好像大學宿舍一樣，不方便又小，不住宿舍每個月有500澳門幣的補貼，即使離得遠，也不想住的特別擁擠。

顯而易見，跨境勞工需根據自己的家庭狀況、個人意願等選擇居住地，居住地的空間隔離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勞工的城市融入，但這並不意味着勞工對於澳門工作、生活環境毫無感知。如被訪者8所言：

他們對本地人就業保護的很好，很多內地勞工很優秀，但是得不到對等的工資和晉升，這其實並不公平。

同樣地，被訪者9的工作為大學老師，但是由於校內薪資體系結構問題，其薪資收入相比同等崗位的本地員工仍有差距。這對於在澳門工作的勞工而言，內心落差無從避免。但又正如被訪者9所提供的資料，即使“同工不同酬”問題存在，仍希望能夠留在澳門工作，雖然原因多樣，但是最主要的是被訪者9所言的“身份”。雖然被訪者9目前並未取得本地身份證，但由於其工作環境，在日常交往的過程中，並未產生如“自卑”、“不合群”等問題。如同被訪者4、被訪者9等，均提及了覺得自己並未與本地人有差異，除了地理位置上的間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際維護等外，個體在社會融入方面具有信心。這不僅與個體內在心態有關，亦與個體在社會中所處的工作性質、社會地位有關。當然，亦有其他觀點。如被訪者3：

我覺得自己和遊客沒有區別，遊客是一年來一兩次，我雖然天天在這裏，但是很有危機感，老闆隨時可以炒了我……每天接觸的也是內地人，除了工作地外，其他的日常和內地生活沒有區別……不覺得自己會成為這裏的一份子。

^① 吳啟焰：《大城市居住空間分異研究的理論與實踐》，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2001年。

在被訪者3的描述中可以看出，其接觸的群體可以概括為“同質同類化群體”，這不僅與被訪者個體的工作環境有關，亦與其本人的性格特點有關。對於澳門—珠海特殊的跨境工作而言，居住的“空間隔離”無從避免。因此，有的被訪者認為自己始終是“城市的異鄉人”，有些被訪者則會積極、主動的尋求“社會融入”，這種差異性及其明顯的劃分，不僅依賴於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，亦和勞工個體的性格、心態、生長環境等有很大的關係。

（三）“空間轉換”過程中的身份、認同改變

勞工在每日的跨境生活中，不僅經歷着城市空間的距離變化，也在跨境工作中產生對城市的全新認知和心態的轉變。如被訪者4，該被訪者原籍廣東，工作原因是於2003年第一次進入澳門，對於澳門的初始城市印象有着不同於其他人的感受，這種極好的城市感知，在被訪者4在有機會前往澳門工作後依然保持。

那時候澳門剛開放賭權，我做記者過來採訪，覺得這裡民風好淳樸，整體感受相當好，這裏人都好有禮貌……那時候開車很規矩，澳葡遺風還在……直到現在我都覺得澳門很好，除了現在人變多了之外。

在被訪者4的觀點裏，並未覺得自己與本地人有甚麼區別，由於工作關係，在日常交往中甚至有些本地人會誤認為他是土生澳門人。這一方面與被訪者4的工作性質有關，另一方面也與自身心態有關。正如被訪者4的觀點，覺得自己心態樂觀，除了身份證上的差異外，已經能夠完全融入到澳門社會。又如被訪者7所言：

覺得自己很有成就感，從未想過能堅持一件事情這麼久，剛來的第一年真的覺得很苦，現在習慣了也就好了，也會慢慢適應這裏的環境，這樣的生活也挺好……我跟其他人還不一樣，他們可能是珠海澳門兩地跑，我是順德、珠海、澳門三城，因為我老家在順德，週末要回去。

被訪者7的話語則更為透徹，被訪者7在澳門工作了三年，一開始覺得異常辛苦勞累，但在適應後會逐漸喜歡、適應，短時間內並不想改變。心態在每日雙城往返的過程中發生變化，這意味着個體對於自我的身份、認同亦會隨着工作生活的不斷變化而產生新的變化。9位被訪者或多或少都會覺得自己的身份既不是澳門人、又不是珠海人，而是有的如被訪者2所言的“半個澳門人”，有的如被訪者3所言的“浮萍”身份。在這個過程中，轉變心態與身份認同是必然的。當然，這裏所言的身份認同，不是身份證上的、制度上的認同，而是文化意義上的認同。認同不僅是個人的心理變化，也反應了人與社會的關係。不同的關係產生了不同的身份變化，也改變了個體對於城市的印象。整體而言，9位被訪者對於城市感知和融入的表述有相似亦有分歧，相似的地方多表現於對城市的“外貌”感官感受，和居住空間較遠的勞累、疲乏的相似生活經歷，無法在“空間”上融入澳門城市的無奈。相反，在對人際關係維持、身份融入的問題上，差異性表述極其明顯。這不僅是外在工作條件與環境的影響，也和勞工本身的心態、性格、生長環境、社交能力等多元維度有關。個體如何認知自己的身份和感受，必然直接影響個體對於城市的感知和融入。

結語

城市對於本地人和遊客意味着不同的經驗環境：本地人總是在城市的偏僻角落、一石一瓦中挖掘出童年的記憶，因為他沒有白白在那裏度過童年；而遊客則是走馬觀花，流於城市的表

面和風景，只在城市的空間裏穿梭，但無法進入它的歷史。^①人群對於城市情感的不同，會改變人群對於城市的印象和感知。跨境勞工既不同於生長於此的本地人，也不同於來此旅行的遊客，甚至在在讀學生也不一樣，這一群體對於城市的印象，來源於工作和每日跨境往返的活生生的日常生活。跨境勞工對於城市的直接接觸，一是在對城市的感官印象即城市建設上，二是與城市有關的人上，他們支援起勞工對於城市最原始的印象。對於跨境勞工而言，最大的危機感不是語言、婚姻等其他問題，而是居住空間的隔離所帶來的融入感問題。空間融入不僅是城市融入的一個重要表現方面，也是造成城市融入障礙的重要因素。^②居住空間隔離造成的城市融入困難，是跨境勞工始終無法在真正意義上融入城市的重要原因。在對9位被訪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，雖然有部分心態樂觀、性格外向且由於工作原因，積極展開在澳門的人際、工作往來，但是每天往返於兩地的奔波，仍然是他們對城市產生隔閡的、無可避免的問題。

對於跨境勞工而言，每日工作往返，會不同於本地人或遊客，勞工既是城市的實際參與者，但也是過客，很少勞工會出現“主人翁”心態。這種形態情感的變化過程，雖並不會產生如無法展開人際交往溝通等問題，但是卻始終無法讓勞工有真正的“本地人”心態。這不僅是“身份證”的問題，亦是城市包容性和融入的問題。城市融入是雙向互動的過程，或者說是一個雙向的現代化過程。^③城市居住空間的分隔，勾連出空間與日常生活中的交集，勞工與本地人伴隨着居住空間的分異，其交往密度必然下降。雖然用不同人群形成“人以群分”的居住分隔作比喻較為不妥，但是跨境勞工與本地人的居住疏離的程度，是勞工無法真正融入城市的重要原因。雖然被訪者積極尋求如婚姻的方式去解決“隔離”問題，但是從“城市融入”到“社會融入”的難度，遠不止空間帶來的“跨境”問題。

結合本研究被訪者所提供的資料，個體對於城市的印象伴隨着勞工在澳門的工作特性、工作時長和社會環境不斷產生變化。這種印象既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也不是固定不變的，而是在勞工對個體身份、態度、生活環境的不斷變化中產生的。跨境勞工對於城市印象的感知，除了舊有的感官感知外，會伴隨着工作時間、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而不斷變化，這些變化構成了他們對於城市的整體印象。進一步而言，居住空間的分隔會成為社會融入的屏障，“空間融入”的困難是勞工每日往返所必須經歷的，但這並不意味着跨境勞工在“身份融入”上有明顯區隔。這裏所言的“身份融入”並不是指獲取本地身份證，而是個體在自我感知上的“融入”和文化意義上的認同。跨境勞工在每日的工作中，在與他人的人際交往中，積極尋求縮小“空間隔離”帶來的“社會融入”差距。因而，當個體認為自身與城市融入的程度越高，其對於“身份”的感知越模糊。這種既不認為自己是本地人，也不認為自己是外地人的自我感知，成為該群體在每日雙城跨境中的常態。

[責任編輯 陳超敏]

① 陳永國：《本雅明譯波德萊爾譯坡：思想在文學翻譯中的旅行》，《外國文學研究》（武漢）2010年第1期，第141—151頁。

② Office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, City of Portland, “Portland Pedestrian Design Guide,” 1998, <https://www.portlandoregon.gov/article/437808>.

③ 梁波、王海英：《城市融入：外來農民工的市民化——對已有研究的綜述》，《人口與發展》（北京）2010年第4期，第73—85頁。